

郭书春和杨国选都完全错读了李曾伯《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

刘合国

（海南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南宋宝庆二年（1226）和三年，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樵和李曾伯的父亲李景翱都在蜀地为官，前者知潼川府，后者任四川总领，李曾伯任四川总领所的属官“蜀总内机”。其间某年李景翱生日时，收到秦季樵寄去的一封贺信，李曾伯代父亲写了一封回信《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李曾伯的回信抑己扬人，用语典雅，层次清晰，孰主孰客一目了然。不料近年来郭书春和杨国选竟然都在两个方面完全错读了这封信：

一、郭书春和杨国选阴差阳错地把《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读成了李曾伯写信恭贺秦季樵生日，并据此认定李曾伯是秦季樵的挚友，全然不顾秦季樵绍熙四年（1193）高中进士，庆元三年（1197）已经第一次知潼川府，而李曾伯1198年才诞生于世，1227年还完全没有进入官员行列。从履历来看李曾伯和秦季樵没有成为挚友的可能，这从李曾伯《回宣谕兵粮奏》里的话“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可以得到确凿的印证；

二、《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里的话“已办雪水松江之钓”本意是说李景翱盼望致仕后能够过上隐居垂钓的生活，而郭书春和杨国选硬生生地把这句话读成了秦家在湖州早就置办了住宅，并借这种错读去反驳周密《癸辛杂识·续集》里关于秦九韶“以术攫取”吴潜土地的记载，实在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就阅读史料、运用史料而言，这是异常罕见的低级错误，因此郭书春和杨国选围绕《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所做的论证工作没有任何价值。

宝祐年间李曾伯经略荆湖南路、经略广南时，在人事、军事、财政、粮饷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困难，李曾伯在三封奏折里提及秦九韶，它们本是研究秦九韶事迹的佐证材料。除了余嘉锡引用过其中第一封奏折外，还没有人意识到它们对研究秦九韶的重要性，更没有人把《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与这三封奏折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宝祐六年秦九韶持贾似道荐书投奔李曾伯，被李曾伯加以位置，又被朝廷迅速解职。李曾伯奏折上的话“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非常值得细品玩味。从秦季樵恭贺李景翱生日、李曾伯代父亲回信来看，秦、李两家肯定存在交谊的。如果秦九韶具有良好的德行风度和军政才能，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李曾伯都会向朝廷求情，争取委任秦九韶以发挥其才华。但李曾伯根本没有这么做，这种反常现象从侧面印证了余嘉锡的观点：在数学之外，秦九韶不足称道。这就是说，就评价秦九韶事迹而言，李曾伯可能就是郭书春求而不得的所谓贾似道、吴潜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方。

秦九韶是褒贬不一的历史人物，但他的声名是不朽的，这不是因为他的人性和才艺，而是因为他写就了流传至今的伟大著作《数书九章》，这才是今人研究秦九韶事迹的根本出发点。关于秦九韶的史料实在太少，要是研究秦九韶时脱离了《数书九章》，那几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意义。

关键词 李曾伯；李景翱；秦季樵；秦九韶；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

中图分类号 O119

南宋笔记大家周密，号草窗，出身于官宦世家。周密学问渊雅，著述繁富，所著笔记体史学著作《齐东野语》《志雅堂杂钞》《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皆盛行于世。晚清刘毓崧撰有《通义堂文集》十六卷[1]，卷十三之《重刊周草窗词稿序》对周密的生平考证甚详，称赞周密为“宋代完人”，序里论及周密与贾似道的关系，云：

其在仕途，受知于马碧梧，（《癸辛杂识》云：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阳马公廷鸾乞去甚苦，遂出寓于六和塔。余受公知，间日必出问之。）而不肯附贾似道。（自景定初至咸淳末，似道当国十余年，草窗无一阙投赠。）

周密“不肯附贾似道”是经得起事实考验的。在《癸辛杂识·续集》[2]里，条目“秦九韶”记载了南宋杰出数学家秦九韶的负面事迹，包括秦九韶“以术攫取”吴潜在湖州的土地并修建起豪华住宅：

（秦九韶）与吴履斋交尤稔。吴有地在湖州西门外，地名曾上，正当苕水所经入城，面势浩荡，乃以术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极其宏敞，堂中一间横亘七丈，求海棧之奇材为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两翬抟风，皆以砖为之。堂成七间，后为列屋，以处秀姬。

这本是一段清晰明了的记载，生动反映了秦九韶为人处世的风格特征。近年来郭书春[3、4、5]、杨国选[6]挖空心思地要把秦九韶打扮成无所不能的圣人，不顾史实地认定周密党附贾似道，认定周密黑白颠倒、疯狂污蔑秦九韶。他们竟然完全错读了南宋名臣李曾伯的一篇四六启文《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载《可斋杂稿》[7]卷十四），并根据自己的错读去反驳周密的这段记载。

关于李曾伯这篇启文，起因是宝庆二年（1226）或三年李曾伯的父亲李景翱生日时，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樵寄去了贺信，李曾伯代父亲回了封信《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当时两位父亲都在蜀地为官。只要认真下点力气，读懂这封正文共计167字的回信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郭书春和杨国选都硬生生把这封回信读成了李曾伯写信祝贺秦季樵生日，由此断定李曾伯是秦季樵的挚友，全然不顾存在于这两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从履历看这两人没有成为忘年之交的可能。再说，

就是从“代”“回”两个字也可以看出李曾伯写的肯定不是生日贺信，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一、秦季樵和李景翱

秦九韶（1202-1261），字道古，南宋杰出的数学家。他在淳祐七年（1247）写就了名垂青史的经典著作《数书九章》，在经过岁月的大浪淘沙之后，《数书九章》在数学史上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根据现存的文献记录，秦九韶第一次在历史上留下足迹是在南宋宝庆二年（1226）正月十二日，其时涪州太守李珣等人陪同秦九韶父子游览涪州（今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白鹤梁，留下了极具历史价值的81字楷书石刻“瑞麟古迹”：

瑞麟古迹

郡守李珣公玉，新潼川守秦季樵宏父，郡纠曹掾何昌宗季文，季樵之子九韶道古，珣之子泽民志可，同来游。石鱼阅八年不出，今方瞭然，大为丰年之祥，此不可不书。宝庆二年正月十二日，涪州太守。

按照《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8]的记载，秦九韶的父亲秦季樵曾两知潼川府。

第一次是庆元三年（1197）秦季樵接替宇文子震知潼川府，任职至嘉泰元年（1201），嘉泰二年由杨辅接任。

注 [8]在记叙秦季樵这次知潼川府时，引用魏了翁诗“送秦秘监（季樵）以显谟知潼川”作为论据，从下面的叙述即可看出这是明显的失误。

第二次是宝庆元年（1225）秦季樵接替李文子，以除显谟阁再知潼川府，任职至绍定元年（1228）。《南宋馆阁续录》[9]卷七记载：

秦季樵，字宏父，绍熙四年陈亮榜同进士出身，治《春秋》。（嘉定）十七年九月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六月除直（注 这个“直”字应该是多余的，理由见后述）显谟阁知潼川府。

秦季樵离开临安时，南宋名臣魏了翁赋诗《送秦秘监（季樵）以显谟知潼川》为秦九韶送行，另一位南宋名臣洪咨夔亦赋诗《送秦秘监还蜀（二首）》相送，洪咨夔诗起句为“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从“瑞麟古迹”可知，秦季樵去涪州会晤李珣时，秦九韶是随行的。

李曾伯（1198-1268），号可斋，有《可斋杂稿》三十四卷、续稿八卷、续稿后十二卷传世，后人将之合为《可斋类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斋杂稿》，云：

《可斋杂稿》三十四卷、续稿前八卷、续稿后十二卷，宋李曾伯撰。

而曾伯则能以事功显。由著作郎两分漕节，七开大阃。通知兵事，所至皆有

实绩。官至观文殿学士。

李曾伯的同代人尤焞序《可斋杂稿续稿》，亦云：

顾今边事孔棘，公以一身横当荆蜀之冲，屹然如长城万里。上之倚公，不啻韩、范。

李曾伯长于边事，以文臣主军，有“知兵”之名，所到之处皆有治绩，为南宋中晚期名臣重将。有关李曾伯父亲的文献比较罕见，《可斋杂稿》卷二十收录了一份李曾伯写给朝廷的奏状《申朝省乞以和余转官加赠先父》，内中写道：

某今更两镇之除，忝八座之列，退而自揣，曷克臻兹。

（先父）嘉定末年，受任饷蜀。时连政每以匱乏告，不啻岁科一千万之有奇。先父始以打算行，继而减作七百万以为率。五年于役，一赋弗加。其视前官，不但费省，至于去替，又以羡闻。平生姓名不玷简牍，虽在归里之后，常怀报国之心。微臣不天，无禄即世，官不过元士，位仅至亚卿。

李曾伯认为自己官阶已至“八座”（尚书级），远远超过父亲的生前官位“元士”和“亚卿”，恳请朝廷将自己因“和余”有功而获得的升官恩赏转而追赠给已故的父亲。文中“嘉定末年”即南宋宁宗年号“嘉定”的最后阶段，即嘉定十七年（1224）。根据文意可知，李曾伯父亲从嘉定十七年（1224）至绍定元年（1228年）“受任饷蜀”，即担任四川总领：总领川陕战区的财赋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这段时间里，李曾伯的父亲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地方军政大员。

绍定元年（1228年），李家父子刚离开四川，李曾伯就创作《醉蓬莱·戊子为亲庭寿，时方出蜀》一词（见[10]），为父亲祝寿，词云：

是人生好处，仕宦归来，享清闲福。屈指吾翁，恰八年荆蜀。星火丛中，风涛局上，转青天乌粟。韶传欣还，里闾相庆，双鬓犹绿。

为报中朝，如今老子，肯把貂蝉，换取松菊。西舍东邻，正新篁初熟。屋仅一椽，田姑二顷，剩种花苜竹。缓引金钗，细斟琼斝，唱长生曲。

这阙词证明李曾伯的父亲在荆襄和四川任职八年，直到1228年出川。为表彰李曾伯父亲“饷蜀”的功劳，洪咨夔代表皇帝起草制文《李景翱和余赏转朝议大夫致仕制》（见[11]），全文如下：

敕具官某：李愷平余之法，百世可行也。居是邦而习其俗，则虽多易办。尔总蜀赋而归，优游家食。以富于才，任我余事，年丰价平，农固乐市，积数踰亿，能无劳乎？蠡升元士之级，尚知告老之荣。可。

李景翱因“饷蜀”被“蠡升元士之级”，得以荣耀致仕，这与李曾伯的记载非常一致。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12]卷八十六收有《太常博士知绍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志铭》，文中写道：“时以郑损制阃四川，李景翱总饷，故

万里及之。”《宋元学案》之卷八十《鹤山学案》在记述王万的条目“知府王淡斋先生万”重复了这个事实：“时郑损制蜀，李景翱司蜀餉，故先生及之。”同时再注意到嘉定十七年（1224）至宝庆三年（1227），郑损任四川制置使，即“时以郑损制阆四川”“时郑损制蜀”，由此可知李景翱就是李曾伯的父亲无疑。《敕修浙江通志》明确记载了李景翱的墓葬信息：

宋四川总领李景翱墓。成化《杭州府志》：在灵凤乡东子山。景翱，丞相邦彦之孙，两淮制置曾伯之父。

这段文字非常清晰地记载了李曾伯的家世，它留下的身份信息与成化《杭州府志》完全一致，只是地名略有差异，成化《杭州府志》的地点为“在灵凤乡架子山”。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从宝庆元年（1225）六月到绍定元年（1228），秦季樵和李景翱大部分时间都在蜀地为官，前者知潼川府，后者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等。虽说两人并非那种垂直的上下级，但在诸多政务上两人肯定是要来来往往的。

李景翱受任餉蜀时，李曾伯受任四川总领所的属官“蜀总内机”，即担任主管书写机宜文字，为李景翱代写文书。这样当秦季樵寄书祝贺李景翱生日时，李曾伯就顺理成章地代父亲回书《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

二、《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释读

李曾伯写作《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的时间，应该是宝庆二年（1226）或宝庆三年，全文如下：

小人不知纪年，正嗟劬瘁；皇览揆予初度，过辱品题。远分玉帐之余辉，来问宝屏之寒色。三复降叹，十袭登藏。

恭惟某官：岷蜀儒英，蓬瀛人物。以螯禁驾墀之望，为鹤林莺界之游。皇极立扶，五福洽彝伦之锡；洪钧气转，八荒同寿域之开。方黑头入相之可期，乃白首为郎之是念。至虔善颂，俯及陈人。

某咄咄伊何，骎骎晚矣。已办雪水松江之钓，尚供祁山斜谷之屯。宠以袞袞，慊然线短。永怀吉甫，颂可继于清风；寄语巴人，韵莫赓于白雪。

朝廷在宝庆元年六月任命秦季樵知潼川府，署时“宝庆二年正月十二日”的“瑞麟古迹”明确称呼秦季樵为“新潼川守”（见“新潼川守秦季樵宏父”一句），估计秦季樵其时到任潼川府不久（洪咨夔的送行诗可以佐证这个事实，稍后论述理由），这封回信不应写于宝庆元年。绍定元年（1228年）李曾伯父子出蜀后，李曾伯就创作《醉蓬莱·戊子为亲庭寿，时方出蜀》一词，为父亲祝寿，内有“是人生好处，仕宦归来，享清闲福”之句，证明李景翱已经致仕，而《代回潼川秦

守贺生日》里有“尚供祁山斜谷之屯”，表明写作时李景翱还在任上，这封回信不应写于绍定元年。因此，这封回信应该写于宝庆二年（1226）或宝庆三年。

李曾伯的回信层次极其清晰，只要浏览一过，就可以判断出它肯定不是一封生日贺信。这封回信抑己扬人，典雅大方，只要逐字逐词逐典地用足功夫，读懂这篇文章实在不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这里稍作解读：

【皇览揆予初度】语出屈原《离骚经》，“初度”即生日。指秦季樵在贺信中使用屈原的这句诗来祝贺李景翱的生日。

【过辱品题】自谦之词，也是敬人之语。“辱”意为屈尊、承蒙。

【玉帐】古代统兵将帅手持兵符玉印，故称其指挥营帐为“玉帐”。

【三复降叹】反复阅读把玩后，发出由衷的赞叹。

【十袭登藏】极为珍重地收藏。

【鳌禁鸳堦】泛指廊庙，即南宋中央政治权力中心。

【鹤林莺界】泛指山林，即远离朝廷之所。

【皇极立扶】扶立帝王之业的根本。

【五福】指五种圆满的人生福份：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典出《尚书·洪范》。

【彝伦】天地人的法理纲常。

【锡】通“赐”，赐予、赏赐。

【洪钧】指天地大自然，也泛指宇宙。

【八荒】天下八方极远之地，代指整个天下或宇宙。

【寿域】指政治清平、无灾无疫、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

【白首为郎】形容怀才不遇，典出《汉武故事》里的颜驷故事。

【至廛】极其庄重的敬辞。至：副词，意为极、最。廛，通“勤”，指殷勤、挂怀。

【善颂】指颂辞得体，源自《礼记·檀弓下》：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陈人】自我的谦称，带有自嘲与悲凉的意味。

【咄咄】叹词，表示惊怪、惋惜或失意时的嗟叹。

【伊】语气助词或代词。

【霅水】即霅溪，在今浙江湖州境内，贯穿湖州城区往北注入太湖。

【袞袞】皇帝给予的赞誉与褒奖。

【慊】心安。

【线短】机遇短暂。

【吉甫】即尹吉甫（前 852-前 775），西周周宣王时期重臣，中华诗祖。

【赓】应和、酬答。

把李曾伯的回信《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翻译为白话文，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整天忙忙碌碌疲惫不堪，已经无力顾及自己的年岁了。承蒙您在我生日这天写信给我，使用屈原的美好诗句“皇览揆予初度”来祝福我，并着力夸奖我的人品功业，我确实不敢当啊。您身在远方，您信里的善意散发出光芒，照耀了我冷清孤寂的寒酸生活。我反复阅读把玩，感动不已，当把您的信仔细珍藏起来。

我恭祝秦守阁下：您是蜀地的儒家英才，超凡脱俗，如同来自仙境蓬莱、瀛洲一般。凭您的声望，您能够身居朝堂中枢，如今却屈尊到远离朝廷的边地来做太守。您坚持治国的根本大道，顺应天理人伦，您治下的百姓能够享受到“五福”临门；您顺应天地造化，您的辖地就像进入了太平盛世。您年富力强时就可望登朝拜相，可您在信中挂念着我这个临近退休之年还只是小官的可怜人。您费心费力送来的美好祝福，垂顾了我这个即将退休之人。

除了感叹命运，我年纪也确实大了，不免有些暮气沉沉。虽然我已备好了供退隐之后垂钓的渔具，但现今我还得为驻守在川陕的军队供应军粮。您用天子一样的口吻来褒奖我，但我的命数和才力不足以承受。我常常记起尹吉甫，希望继承他的清正风骨。您的来信有如阳春白雪，我这个下里巴人难以写出与此相匹敌的回信。

以上翻译肯定算不上完美，但主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的第三段就是书写李景翱的自况，对其中“已办霅水松江之钓”一句，通过上下文即知，它的本意是说，李景翱准备退休后能够过上简单的隐居生活，比如在水边钓钓鱼，并且已经置办了钓具。“已办霅水松江之钓”与秦九韶家在湖州是否修建了住宅完全没有关系。还有，“松江”与湖州全然无关，虽说“霅水”可以用来指代湖州，但绝对不可以用“霅水松江”来指代湖州。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两个互不统属的地名连用时，常常用来指代一个比这两者更广泛的区域，肯定不能用来表示两者中的某一个地名。从地理层面来说，“霅水”即霅溪，在今浙江湖州境内，是太湖的重要源流之一；而“松江”即吴淞江（意为吴地之松江），唐宋时期是太湖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入海通道，东流入海。“霅水”与“松江”通过太湖相连，当二者并提时，隐含着人们对江南的这两条重要水系的总体认知，这种并提常出现在描绘江南水乡的诗词中，借指太湖乃至江南的辽阔水域。比如五代至宋初文学家孙光宪（901-968）之《渔歌子》写道：“经霅水，过松江，尽属侬家日月”，形象地描绘了舟行于两水间的自由自在。南宋文学家葛立方（?-1164）的诗《沿檄省亲复还书呈叔能同

官》也同样写道：“云间霁水往来航，风雨几番腾客装”，这里“云间”即松江。

值得指出的是，从《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里的话“方黑头入相之可期”出发，可以证明前面引用《南宋馆阁续录》卷七的记载“秦季樵，宝庆元年六月除直显谟阁知潼川府”肯定是有问题的，该句需要删去“直”字，正确的记载应该是“秦季樵，宝庆元年六月除显谟阁知潼川府”，原因有三。其一，魏了翁赋诗为秦九韶送行，标题为“送秦秘监（季樵）以显谟知潼川”，没有“直”字。从情理而言，魏了翁的记录完全是针对秦季樵个人的，应该比《南宋馆阁续录》的泛泛记录更为可靠。按照《宋代官制词典》[13]，“显谟阁学士”的品位为正三品，“显谟阁直学士”的品位为从三品，而“直显谟阁”的品位仅为从七品，以魏了翁的地位修为，断不至于把“显谟阁直学士”或“直显谟阁”误记为“显谟”。其二，在南宋，潼川府是“节度州”（三品州），秦季樵以正三品的“显谟阁学士”知潼川府才是合理的安排。从魏了翁的记载来看，秦季樵是以“显谟阁学士”知潼川府，这无疑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其三，按照《宋代官制词典》，元丰改制后“秘书省少监”的品位为从五品，“在诸少卿、监中，仅次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位居大理寺少卿等七寺少卿及少府、将作、军器少监之上。”而“直显谟阁”的品位仅为从七品，远在秘书省少监之下。秦季樵第二次知潼川府前，已是正五品的“秘书省少监”，绝无以从七品的“直显谟阁学士”出知潼川府的可能。再说，要是秦季樵真以从七品的“直显谟阁学士”出知潼川府，李曾伯绝无写出“方黑头入相之可期”的可能，否则李曾伯就是在嘲弄秦季樵了。

三、郭书春和杨国选错读《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

从《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出发，肯定不足以判断秦季樵与李曾伯是什么挚友，其实，他们也根本不是什么挚友，这从李曾伯《回宣谕兵粮奏》里的话“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可以得到确凿的印证。从“已办霁水松江之约”出发，也根本推不出什么秦家在湖州早就置办了住宅。明白了这两点，郭书春和杨国选的下列言论就不攻自破了。

2009年郭书春在《重新品评秦九韶》[4]里说：

秦季樵与魏了翁（1178-1223）、洪咨夔（1176-1236）、李曾伯（1198-?）、李刘等相友善。李曾伯是抗金、抗蒙名将，边境之事，知无不言，遭到贾似道的嫉恨。

注 这里“秦季樵与李曾伯相友善”是没有依据的。《重新品评秦九韶》又说：

秦氏在秦季樵时已将家安置在湖州。李曾伯在贺已任潼川太守的秦季樵生日时说“已办霅水松江之钓，尚供祁山斜谷之屯”。霅水即霅溪，是苕水等四条溪水在湖州会合后的名称，东北流入太湖。祁山斜谷则指潼川。可见秦家于13世纪20年代初秦季樵在南宋中央政府中任职时已寓居湖州，而不是以往著述所说从秦九韶自吴潜（1196-1262）处得到湖州西门外苕水畔曾上的地皮建豪华住宅时开始的。就是说，秦氏举家最迟在20年代初就离开了远离政治中心而又不安定的安岳，搬到了比较安定而又距临时首都较近的湖州。

注 这段话在整体上是有问题的，“秦氏在秦季樵时已将家安置在湖州”“李曾伯祝贺秦季樵生日”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此外，无论从哪方面看，上面引文中郭书春的“祁山斜谷则指潼川”之说都是无法成立的，这句解说完全背离了《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的原意。从地理上说，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斜谷位于今陕西眉县，而潼川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祁山”“斜谷”与“潼川”完全没有关联，“祁山斜谷”绝对不能用来指代“潼川”。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两个互不统属的地名连用时，常常用来指代一个更广阔的区域，或者指代一种抽象的文化意向，肯定不能用来表示另一个与这两者毫无关联的地名。从历史上说，“北伐中原，还我河山”“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义不计其利”是时代对南宋仁人志士的道德要求，这种时代要求空前地提升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形象。湖湘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张栻（1133-1180）以春秋笔法撰写《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通篇以“侯”尊称诸葛亮，行文恭敬至极，走出了神圣化诸葛亮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在诸葛亮被神圣化后，“祁山斜谷”就演变成为了诸葛亮北伐的代名词，远远地超越了地理的意义，构成了中华民族一个神圣的文化符号。例如南宋名臣崔与之的诗作《送聂侍郎子述》里，就有“早辨出师诸葛表，祁山斜谷郁绸缪”之句。从《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文本上说，其时李景翱已近致仕之年，但责任繁重，正总领川陕战区的财赋军马钱粮，李曾伯非常精准地借用了“祁山斜谷”的典故，代父亲用“尚供祁山斜谷之屯”表达了要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远境界，切事切情切理，浑然天成，不露一丝斧削痕迹。虽说这封回信通篇都在谦己扬人，但“已办霅水松江之钓，尚供祁山斜谷之屯”才是这封回信的点睛之笔，李曾伯代父亲写出了暮年烈士怀有的深沉情怀，真是知父莫如子。李曾伯胸襟博大笔力沉雄，后来为国为民“两分漕节，七开大阊”，终“以事功显”，从这两句话可以见其端倪。

郭书春《秦九韶传》[5]延续了[4]的错读。该书P025写道：

秦季樵的另一位朋友--抗金、抗蒙名将李曾伯（1198-1268）在祝贺秦季樵生

日的《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中云：“岷蜀儒英，蓬瀛人物。”蓬瀛指蓬莱仙山，代指今山东地区。

注 这里“蓬瀛指蓬莱仙山，代指今山东地区”是值得商榷的。这里“蓬”意指蓬莱仙山，而“瀛”则意指瀛洲，自古相传蓬莱、瀛洲、方丈是东海的三座仙山，它们互不相属。在《列子》[14]之《汤问篇》里，夏革回答殷汤时，也说：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

虽说蓬莱仙山常与山东烟台联系在一起，但瀛洲在古籍中多指向浙江以东的远海，与山东完全无关。李白的著名诗篇《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把瀛洲与浙江的天姥山对举的，诗曰：“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蓬瀛”从来就是一种文化意象，不能作为具体的地理名词使用，“蓬瀛指蓬莱仙山，代指今山东地区”这句话违背了基本的汉语规范。

《秦九韶传》[5]P028 写道：

秦氏在秦季樾时已将家安置在湖州，李曾伯在贺已任潼川太守的秦季樾生日时说他“已办霅水松江之钓，尚供祁山斜谷之屯。”霅水即霅溪，是苕水等四条溪水在湖州汇合后的名称，向东北流入太湖。祁山斜谷则指潼川，可见秦家于13世纪20年代初秦季樾在南宋朝廷中任职时已寓居湖州，而不是以往著述所说从秦九韶自吴潜处得到湖州西门外苕水畔名为曾上的地皮建豪华住宅时开始的。就是说，秦氏举家最迟在20年代初就离开了远离政治中心又战乱频仍的安岳，搬到了比较安静又距临安较近的湖州。

秦臻舜、秦季樾父子学识渊博，为政清廉。秦季樾的挚友也大多是学养深厚，主张抗金、抗蒙的正直忠良之士。……李曾伯（1198-1268）是抗金、抗蒙名将，边境之事，知无不言，遭到了贾似道的嫉恨。

无独有偶，杨国选《秦九韶生平考》[6]也完全错读了李曾伯的回信。杨国选在书里共8次引证《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其中1次出现在脚注里，7次出现在正文里的5个章节里，这说明《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是杨国选的核心史料之一。

杨国选在《秦九韶诞生普州》一节写道：

“岷儒”是乔行简对秦季樾的赞誉和雅称，李曾伯在《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中也赞誉秦季樾为“岷蜀儒英”。

注 这里使用《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文章《杨国选考定秦九韶生年的史料纯属刻意造假》（PSSXiv: 202605.00881）已经证明乔行

简《贺秦秘阁季樵得子》是杨国选刻意伪造的，在现存史料里还没有发现乔行简记述秦季樵的文字，这里乔行简称秦季樵“岷儒”自然也是杨国选的发明。

杨国选在《秦九韶出生地之争》一节写道：

秦季樵的挚友、南宋名将洪咨夔赋诗《送秦秘监还蜀》赞（秦季樵）曰：“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岷峨”指今四川，“淮海”指今山东南部、江苏省北部一带。南宋名将李曾伯在《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中赞（秦季樵）曰：“岷蜀儒英，蓬瀛人物”。“岷蜀”泛指四川。洪咨夔、李曾伯的诗，都点出了秦季樵的家乡与籍贯。

注 杨国选把洪咨夔（1176-1236）称为“名将”是非常不靠谱的，洪咨夔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文官，《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之《洪咨夔传》里，只有下面的记载与军事稍微有点关系，仅仅凭借这点记载肯定是无法称洪咨夔为名将的：

崔与之帅淮东，辟置幕府，边事纤悉为尽力。丘寿隲代与之为帅，金人犯六合，扬州闭门设守，咨夔亟诣寿隲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扬，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动，而金人且骄必来矣。第当远斥堠、精间谍，简士马，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晏然如平时。若金人果来犯，某当身任之。”寿隲愧谢。已而金人果遁。

杨国选解读“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说“‘岷峨’指今四川，‘淮海’指今山东南部、江苏省北部一带。”这肯定没有任何价值的皮相之论，对理解洪咨夔的这两句诗毫无帮助。要读懂这两句诗，需回到洪咨夔的原诗：

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

识面岁华晚，论心春昼长。

有怀胡去国，无愧好还乡。

呼酒犒三老，柁楼天正凉。

很明显，洪咨夔在用前两句诗赞颂两位过去的人物，并借此赞颂秦季樵，这是非常典型的文学用典。在华夏文化里，自古名迹胜境，常常地以人传，前面提到的“祁山斜谷”就是诸葛亮北伐的标志，已经与诸葛亮浑然一体不可分离。这里“岷峨”“淮海”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学指代现象。“岷峨人物”指代眉州苏轼，苏轼是蜀人最引以为傲的人物，出生于西川路眉州，眉州处在岷山与峨眉山之间。苏轼在诗词中抒发羁旅思乡之情时，屡屡用“岷峨”指代家乡。如《满庭芳·归去来兮》曰：“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南乡子·春

情》曰：“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满江红·江汉西来》曰：“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因为苏轼崇高的历史地位，“岷峨”就成为了苏轼的家乡符号，已经远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岷峨人物古”是洪咨夔借苏轼夸赞秦季樵是一个具有古风的四川人。

在洪咨夔的这首诗里，可以确定“淮海”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人名，“淮海”指代秦观。秦观，扬州高邮人，其诗词文集名为《淮海集》，后世尊称秦观为“淮海先生”“淮海居士”。秦观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送少章从翰林苏公馀杭》曰：“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直接把“淮海”与秦观紧密关联。秦观位于无锡惠山的墓址入口牌坊上刻有“东南淮海，国士无双”。自宋代以降，“淮海”就是秦观的标志性代称。秦季樵与秦观同姓，洪咨夔非常机敏地利用了这一点，用“淮海姓名香”来称赞秦季樵的美好名声。再来看“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洪咨夔巧妙地把苏轼和秦观对举，以苏轼和秦观为背景来褒扬秦季樵，实是独具匠心之举。

也许理解“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并不容易，郭书春在[5]里记述秦九韶的家世，同样发生了错读，书里写道：“岷峨是岷山、峨眉山，代指普州、潼川等蜀地，淮海借指鲁郡。鲁郡曾属普州，即淮海地区。”这个解释错得比杨国选还离谱，几乎令人无法正视。郭书春用“岷峨”代指“普州”“潼川”，用“淮海”借指“鲁郡”，实属异想天开，这种解读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洪咨夔诗的最后一句“柁楼天正凉”点明他送别秦季樵的时间是在宝庆元年（1225）的秋冬时节，这与“瑞麟古迹”称呼秦季樵为“新潼川守”在时间上是高度吻合的。随之，可以确定李曾伯写作《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应该不是在宝庆元年。

杨国选在《书香门第 仕宦之家》一节写道：

洪咨夔在《送秦秘监还蜀》中赞誉秦季樵“岷峨人物古，淮海姓名香”，南宋名将李曾伯在《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中也赞誉秦季樵为“岷蜀儒英，蓬瀛人物”，魏了翁等挚友也有诗赞誉秦季樵。秦季樵学识渊博，为官清廉，政声亦佳。秦季樵的挚友魏了翁、真德秀、乔行简、崔与之、许奕、洪咨夔、李曾伯等，皆知识渊博，学养深厚，为官正直。他们忠言谏论，力陈时弊（注 原文如此，应为“时弊”），主张抗金、抗蒙，皆为南宋忠良之士，朝廷重臣。

注 真德秀、乔行简、崔与之、许奕、洪咨夔、李曾伯均入《宋史·列传》，秦季樵没有入传，在现存相关传记、方志中，还没有见到秦季樵与真德秀、乔行简、崔与之、许奕直接往来的记载，称他们为挚友是可疑的。又，“重臣”一词在中国文化里具有特定的含义，专指那些能够左右朝廷，甚至左右国家命运的大

臣，是绝对不能滥用的。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能被成为“重臣”者屈指可数。魏了翁、真德秀、乔行简、崔与之、许奕、洪咨夔都是不能被称为“重臣”的。

杨国选在《潼川府郫县义兵首》一节写道：

宝庆元年，秦季樾在潼川府任上过生日，挚友李增（注，原文如此，应为“曾”）伯赋诗《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相贺。由此证实，宝庆元年六月，秦季樾诏除直显谟阁知潼川府，已经离开京城临安，赴任潼川府。

注 《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是李曾伯代替父亲李景翱写给秦季樾的四六启文，起因是秦季樾祝贺李景翱的生日，它根本不是诗，“李曾伯赋诗”之说完全不能成立。从洪咨夔诗可知，宝庆元年六月，秦季樾肯定还没有离开京城临安，杨国选说秦季樾“已经离开京城临安”完全没有依据。

《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4次出现在《重修湖州秦氏祖宅风波》一节，包括1次脚注，这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杨国选断言秦家在湖州有祖宅：

秦氏祖宅是绍熙初年所置，因少有人居，风雨斑驳。秦九韶萌生改造祖宅，给母亲一个崭新的居住环境，让她淡化对父亲的思念，颐养天年的想法（注 原文如此）。

嘉熙四年（1240）冬十月，秦九韶在湖州西门外苕水之畔的倒渚汇上，着手设计改造祖父置下的宅邸。

杨国选在脚注里声称上面第二段文字来自《中国数学通史：宋元卷》[15]，经过查阅比对发现，杨国选改变了《中国数学通史》的叙述，照录相关原文如次：

秦九韶初到江南做什么，不见记载，不过他却从吴潜手中捞到在湖州的一块地方：“吴有地在湖州西门外，地名曾上，正当苕水所经，入城面势浩荡，（秦九韶）乃以术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极其宏敞：堂中一间，横亘七丈，求海筏之奇材为前楣，位置皆匠心。凡屋脊两翬抟风，皆以砖为之。堂成七间，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秦九韶用什么手段“攫取”了吴潜的这块地方不得而知，而建筑得如此之豪华住宅非一日之功。

很明显，《中国数学通史》认同周密的记载，认为秦九韶确实攫取了吴潜的土地，只是不知道“秦九韶用什么手段‘攫取’了吴潜的这块地方”。《中国数学通史》根本没有提到秦家祖宅之事。杨国选又一次伪造了史料，并且使用编造的史料为秦九韶辩白。

再摘录《重修湖州秦氏祖宅风波》的几段文字：

宝庆元年（1225）六月，秦季樾以直显谟阁知潼川府。秦季樾的挚友、南宋名臣李曾伯《代回潼川太守贺生日》云：“已办晋水松江之钓，尚供祁山斜谷之屯。”晋水即晋溪，是苕水等四条溪水在湖州会合后的名称，东北流入太湖。祁

山斜谷则指潼川府路。可见 13 世纪 20 年代初，秦季樾在南宋中央政府任职时，在湖州就有寓所，而不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所说，秦九韶玩弄权术，从吴潜处得到湖州西门外苕水畔的土地修建豪宅。

注 这里“祁山斜谷则指潼川府路”存在常识性错误，见诸前面的叙述。杨国选还煞有介事地对秦家宅邸进行分析：

至于史料证实的秦季樾在湖州的寓所是什么时候所置，有两种可能：

其一，有可能是秦季樾的父亲秦臻舜在湖州所置。

其二，有可能是秦臻舜在湖州置有寓所。李曾伯《代回潼川太守贺生日》，就是秦季樾在湖州有宅邸的史证。

《重修湖州秦氏祖宅风波》结尾说：

因此，只有秦臻舜早年在湖州置地建房，为秦季樾留下祖宅，挚友李曾伯给秦季樾贺生日词中“已办霅水松江之钓，尚供祁山斜谷之屯”之说才合乎情理，不致与事实相悖。周密“秦‘以术攫取’吴潜地”之说，显然是有悖史实，属无端攻击。

除了错读《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之外，郭书春和杨国选还异曲同工地从秦九韶与吴潜的关系出发，质疑周密“秦九韶以术攫取吴潜土地”之记载，这种质疑的立足点是值得商榷的。1934 年，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深刻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是一针见血之论。在阅读历史研究历史时，应该站在当事人所处的时代来思考和评价，否则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隔阂肤廓之论。按照今日的眼光，秦九韶要是攫取了吴潜的土地，吴潜肯定是不善罢甘休的，但放在南宋，这件事对吴潜来说基本就是无关痛痒的。宋南渡之后，其领兵将帅和豪门家族多广建宅邸，豪侈远超前代，杨存中的奢靡之风一直广为流传，清代赵翼《陔余丛考》[16]卷十八《南宋将帅之豪富》记载：“杨和王建第洪福桥，欲以西湖水环其居，奏于上。上令密速为之，恐外廷有言者，遂督濠兵连夕浚成。”在南宋绍兴年间的统兵大将中，岳飞的家产是最少的，他在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被调离军队，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遇害，随后他的府邸被朝廷抄没并被辟为太学。《咸淳临安志》[17]卷之八《国子监》和卷之十一《太学》分别记载：

绍兴三年六月，诏即驻蹕所在学置监，仍置博士二员，以太学生随驾者三十六人为监生。十三年，临安守臣王唤请即钱塘县西岳飞宅造国子监，从之。

绍兴十二年，诏礼部讨论太学养士法，仍令临安府权于府学措置增广，遂置祭酒、司业、博士、正录，定养士额。十三年六月，临安守臣王唤即岳飞宅建学，成。

《梦粱录》[18]卷之十五《学校》也有记载：

高宗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太学在纪家桥东，以岳鄂王第为之，规模宏阔，舍宇壮丽，学之西偏建大成殿，殿门外立二十四戟，大成殿以奉至圣文宣王，十哲配享，两庑彩画七十二贤，前朝贤士公卿诸像皆从祀，每岁春秋二丁，行释奠礼，命太常乐工数辈用宫架乐歌《宣圣御赞》。

虽说岳飞律已极严，但从这些记载亦可见岳飞府邸规模相当庞大。在南宋，从来都以名节自许的士大夫多屈服于富贵利禄，那些世族大户兼并占据了大量土地，数量惊人。南宋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上呈奏议《备对札子（三）》（见[19]卷五十一），痛斥那些豪门对土地之掠夺：

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亚乎此者，又数家焉。

南宋端平二年，王迈《乙未馆职策》（见[20]）亦言：

至於曩者权门厮役嬖妾之家，金帛山积，有拥二三十万贯者，何惮而不籍之官？台臣尝言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何疑而不没之官？

这是上呈朝廷的，反映的现象令人触目心惊。南宋景定四年（1263），贾似道主导推行“公田法”，一个基本政策是按照官品限定官员占田面积，超出部分由政府强制回购。按照常理常情，吴潜出身世家，在南宋的这种潮流之下，几乎不可能独善其身，他家族占有的土地不会是一个小数目，秦九韶不管使用什么手段从他那里拿走一点宅地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根本无需大惊小怪。或许，秦九韶就是“以术攫取”了吴潜的土地，周密只是如实记录而已。

郭书春和杨国选都完全错读了《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实在不知两人孰先孰后，也不知两人是否殊途同归。尽管他们奋力反驳周密的记载，但客观事实是无法否认的：没有周密的记载，秦九韶的诸多生平事迹就不可能留存于世。

四、李曾伯作为“第三者”的旁证

《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写作于宝庆二年（1226）或宝庆三年，这封回信能够表明李、秦两家是存在交谊的，至少李曾伯奏折上的话“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大概率不是真的。其时秦季禔知潼川府，年龄十有八九超过了六十（秦季禔在1193年高中进士），李景翱任四川总领，也临近致仕，秦季禔和李景翱都迈入了老年的行列，秦九韶和李曾伯都随侍各自的父亲。在这两年里，秦季禔与李景翱应该是见过面的，他们的治所相距千里。从秦季禔去涪州会晤李珣时（两人治所相去不过数百里），秦九韶陪同前往来看，两位父亲会晤时，他们的儿子大概率也会随行。这就是说，李曾伯与秦九韶大概率在这期间见过面。

当然《代回潼川秦守贺生日》没有一字涉及秦九韶，保佑六年李曾伯在上呈朝廷的三封奏折里提到了秦九韶，在这些奏折里完全看不到一句李曾伯称道秦九韶的话，这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可斋续稿后》卷六收有“回宣谕兵粮奏”（见[7]），涉及秦九韶的文字如下：

臣所准圣谕，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今年正月初忽至长沙，持淮阃书相嘱，令位置之。臣是时即谕以此行入广，恐无可相处，即送之以礼。九韶乃欲索回淮阃之书，谓数千里挈家而来，不可徒还。臣重于违淮阃之意，却之而去，虑其以语言相谋，实未能深知其人也。未几，径来广中，适琼筦阙守，应飞亦加从史，遂令暂权，所以未敢奏申乞与为真，亦疑之也。今恭奉圣旨，臣即已作书，且唤之回幕。目前择守亦难其人，只得辍幕中之士，令参议官陈梦炎俾往权管，旦夕即便起发。俟九韶到此，臣当厚遗以遣其出广。如梦炎儒雅而晓畅，必能保海滨之相安。今者冒炎瘴，步鲸波，亦是强其一往。却望圣慈特与早颁真命，庶可使人。

这是三封奏折里时间最早关于秦九韶信息量最大的一段文字。要准确理解这段文字背后的隐含意义，需要了解1250年代南宋面临的危急形势和复杂的人事背景。当时李曾伯与贾似道是南宋两位最重要的边事统帅，分别代表着南宋两大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宋史》[21]列传第一百七十之《牟子才传》记载：

（牟子才）又言：“首蜀尾吴，几二万里。今两淮惟贾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为寒心。”谓：“宜于合肥别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别立荆湖制置司，且于涟、楚、光、黄、均、房、巴、夔、绵、剑要害之郡，或筑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闻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

贾似道骄横霸道如此。淳祐十年（1250），李曾伯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他上任后即占据襄、樊两城并修浚城池，着手重建襄、樊防务，彻底修正前任贾似道采用的消极政策，成效显著。淳祐十一年，李曾伯抗击入侵的蒙古军队，取得光复襄、樊两城的辉煌战果，理所当然地受到宋理宗的褒扬，宋理宗御笔诏书（见[22]卷三十四）云：

襄阳要区，积年未曾经理，每关忧顾。李曾伯受任边阃，抗志远图，俾襄、樊二城一日复旧，计虑密而用力多矣。且按兵毆敌，观听无哗，缮城峙粮，规略素定，必耕屯之并举，与守备以俱全。载嘉忠勤，宜示褒劝。可除宝谟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职依旧。

宝祐二年（1254），李曾伯在襄阳岷山石壁上镌刻名垂青史的“襄樊铭”，这篇铭文激昂慷慨，大气雄浑，亦颇悲壮不详：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

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岷。其铭曰：壮哉岷，脊南北；繫壙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贾似道不满李曾伯完全改变了他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期间采取的政策，更嫉恨李曾伯收复襄、樊两城的赫赫战功，他施展权谋手段，迫使李曾伯承受了巨大压力。在宝祐元年（1253）、宝祐二年李曾伯前后九次上《乞休致奏》主动提出辞呈。在国家大政特别是在军事防务上，李曾伯和贾似道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九《李曾伯传》明确记载：“曾伯初与贾似道俱为闽帅，边境之事，知无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竞其用云。”这个背景有助于理解李曾伯奏折里的文字。

非常值得玩味的是奏折里的“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一句，按理说这是有悖于事实的，但李曾伯非常坚决地声称不认识秦九韶，这是出于言不由衷？这是出于不肖为伍？回答只能见仁见智了。

奏折里“淮闽”即贾似道，他与吴潜也是水火不相容。秦九韶既“与吴履斋交尤稔”，又能从贾似道手里拿到推荐书，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对他来说“以术攫取”吴潜的土地不会是一件困难的事。。秦九韶“持淮闽书”到长沙要求李曾伯予以安排位置，这当然是贾似道的权谋之道。如果真像郭书春《重新品评秦九韶》《秦九韶传》以及杨国选《秦九韶生平考》所描写的，秦九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精通天文历法”，一身兼“气象学家”“建筑学家”“农田水利专家”“军事家”“理财家”“骈俪诗词的高手”，在国家险象环生人才紧缺之际，像贾似道这样顶尖的权谋大师，应该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积极使用秦九韶之长，不可能把秦九韶推荐给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李曾伯。反过来，秦九韶应该是李曾伯的故人，又持有贾似道的推荐书来投，要是秦九韶拥有出众的人品和才华，李曾伯自然要顺水推舟地予以安置，但长沙见面时李曾伯直接拒绝了，只是“送之以礼”，尽到故人之情而已。从贾似道和李曾伯的处置方式来看，秦九韶应该是当不起“不可多得的全才”“军事家”“理财家”的，当时贾似道和李曾伯都太需要这种人才了。

离开长沙后没多久，秦九韶又到广中来找李曾伯，即“未几，径来广中”，这次李曾伯加以安置，让秦九韶“暂权琼筦”。在接到圣谕要求撤回秦九韶后，李曾伯立即表示服从，没有为秦九韶作任何辩护，没有说一句象征性的好话。“俟九韶到此，臣当厚遗以遣其出广”明白地揭示秦九韶确实是李曾伯的一位故人，非故人何能如此相待。李曾伯两次对待秦九韶的方式看似反常，实则是以平常心处之。秦九韶与吴潜、贾似道都能够进行实质性交往，于此可见他为人处世的世故圆滑。这年秦九韶至少两次拜见李曾伯：正月在长沙，后在广中。按照秦九韶

的处事风格，他肯定会与李曾伯谈到上一代的交谊。李曾伯的奏折是六月写的，“秦九韶者，臣本与之素昧”一句应该是李曾伯深思熟虑后的表达，隐藏着李曾伯对秦九韶的负面评价。

之后李曾伯上呈《回奏宣谕》（载《可斋续藁后》卷六），当时李曾伯面对一系列非常棘手的边防难题，外部蒙古大军压境，安南态度暧昧，内部兵力、粮饷也存在困难，琼州、钦州、宜州还缺少良将，奏折里说到秦九韶：

琼、钦、宜缺守，琼已差陈梦炎往替秦九韶；钦则张全既病，目前只得权委拱以节制兵船，暂权郡组。拱虽力辞，臣已与之约，断不敢以正任有妨，冬防后向阙供职，此后却须别择正守；宜州则王该既托疾，若取材于远，未易猝至，又恐辞避。总管彭宋杰亦是淮将，曾权宜州，未免委之再任。俟其到官后，若能加意措置边防职事，续容具奏。

李曾伯身在边地，在用人上捉襟见肘，于此显而易见。在另一份《回奏宣谕》里，李曾伯再次提及了人才紧缺问题，也提到秦九韶：

又准圣谕，以臣昨奏柳州阙守，乞除陈梦炎，仰蒙圣慈特赐矜从，颁下成命，臣已祇领讫。但近因恭奉圣旨唤回权琼州秦九韶，臣以一时艰于择代，已委梦炎往权琼筦。既而正以前奏未报，尚令少留，却权委知南宁军曾先暂管琼州，替秦九韶回司。今来虽准敕守柳之命，未敢以省割付之。若是续蒙圣旨，以梦炎改守琼州，则柳州容臣别选择奏闻。或恐朝廷别除琼守，却令梦炎前去柳州之任，谨拱俟圣旨。宜、钦两守臣近遵圣谕，已差臣拱、彭宋杰前去兼权去讫。臣拱已与之约，俟冬防毕日令自赴阙供职，向后别容选守闻奏；宋杰俟其到官，察其于职事勤怠，却作区处。

如果秦九韶真正具有良好的德行风度和军政才能，真如郭书春《秦九韶一将数学进之于道》一文所断言：“秦九韶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李曾伯都应该向朝廷求情，争取委任秦九韶以发挥其才华。但李曾伯在这三封奏折里都没有做任何努力，甚至声称与秦九韶素不相识，这种异常现象也许从侧面印证了余嘉锡的观点：在数学之外，秦九韶不足称道。

注 郭书春《重新品评秦九韶》言：

总之，没有别的证据，我们是无法根据刘克庄、周密的言论而断定秦九韶的人品有问题的。在没有贾似道、吴潜两派之外的第三者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秦九韶的自述比刘克庄、周密的文字更为可信。

这里“秦九韶的自述比刘克庄、周密的文字更为可信”非常武断，有哪位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留下的文字是反面的？按照郭书春的这个逻辑，历史上的那些大奸大恶都能够摇身一变成为圣人。就评价秦九韶而言，李曾伯可能就是郭书春求

而不得的所谓贾似道、吴潜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者。

五、秦九韶因《数书九章》而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的一段对话，其中穆叔在对话里历史性地划清了生前“世禄”与身后“不朽”的严格界限，在伦理上精准有力地驳斥了范宣子妄自尊大的虚言，明确断言“世禄”在深刻性上远远不能与“不朽”相提并论，他的“三不朽”论说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明走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勾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穆叔的“三不朽”价值观超越了世俗，超越了时代，是激励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建功立业的精神渊藪。西晋政治家、军事家、经学家杜预（222-285）是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也是《左传》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自称有“《左传》癖”。杜预在刘歆、贾逵等人的基础上，融《春秋》与《左传》于一炉，革命性地对《春秋》经文与《左传》传文进行混编加注，创造性地厘清了经与传的对应关系，完成了三十卷巨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一举奠定了《左传》在经学中的核心地位，自问世以来这部经典就一直笼罩着后世的《春秋》《左传》研究。杜预终生服膺“三不朽”之说，以“三不朽”为终生追求，晚年他功德巍巍，自谦“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庶几可也”，毫无疑问，“三不朽”深深融入了杜预的血脉和生命。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杜预是同时入祀文庙与武庙的第一人。其实，同时入祀文庙与武庙者，唯有诸葛亮和杜预两人而已。

唐代孔颖达（574-648）奉敕修撰《五经正义》：《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是中华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其中《春秋左传正义》[23]即以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底本，孔颖达疏完全基于杜预注展开。《春秋左传正义》为“三不朽”写下了明确且权威的定义：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故服以伏羲、神农，杜以黄帝、尧、舜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德也。《礼运》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后代人主之选，计成王非圣，但欲言周公，不得不言成王耳。禹、汤、文、武、周公与孔子皆可谓立德者也。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故服、杜皆以禹、稷当之，言如此之类，乃

是立功也。《祭法》云：“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法施于民，当是立德之人。其余勤民定国，御灾捍患，皆是立功者也。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论语》称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没，其言存立于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言也。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谊、杨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

这些至理名言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规范着华夏儿女的志向追求。就立言而言，立言之人自然会因其所立之言而不朽。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亦言：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止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

数千年来，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这个文明薪火相传长盛不衰，归功于广大普通民众的辛勤耕耘和无数英雄人物的奋斗牺牲。在这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里，肯定包括了那些因“立言”而永垂不朽的人物，他们把真知灼见诉诸文字留存于世，散发出万丈光芒，善莫大焉。在这些立言之人中，肯定包括刘徽、李淳风、秦九韶、程大位、徐光启等伟大的数学家。

翻开中国数学史，数学本是中国人民擅长的学科，中国的数学水平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畴人传》记载了二百七十余位中国畴人的事迹，因为历史的深刻性，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这些倜傥非常之人不全是完美无缺的人物，有的人可能也犯有错误，并有种种瑕疵，秦九韶可能就是一位存在道德污点的大数学家。自南宋末年以降，对秦九韶品行的评判就见仁见智。余嘉锡在其壁立千仞的著作《四库提要辨证》[24]里深刻指出：

以九韶之才之艺，讲求绝学，有所发明，其著述足以自传于后。惜不自顾籍，贪横无状，予人以攻击之端，虽爱之者无以为之解免。世之有才而不护细行者，可以鉴矣。

尽管如此，秦九韶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仍然享有崇高地位，就数学内容的创新性和深刻性而言，他的伟大著作《数书九章》的地位是稳固的，U. Libbrecht 撰写的专著《Chinese Mathematic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和吴文俊主编的文集《中国古代数学家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研究》诠释了这部名著已经产生的深刻影响。《宋史·艺文志》不载《数学九章》（即《数书九章》），清初倪灿《宋史艺文志补》[25]把《数学九章》列入了“经史子集”之经部，补记的

文字为“秦九韶《数学九章》九卷（鲁郡人）”，就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数书九章》进入了中华经典的行列。秦九韶发明的中国剩余定理是最质朴最有效的数学工具之一，是数论、代数学等教材里必须阐述的基本内容，在当今数学、计算机科学、密码学等领域发挥着基本作用。按照《春秋左传正义》“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的标准，秦九韶肯定属于立言之人，在中国古代的伟大数学家中，他的名字当名列前茅。

1929年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撰写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留下了辉耀千古的文字：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借用“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来描述《数书九章》应该是大致不差的。也许秦九韶生前的所作所为严重背离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但《数书九章》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他的作者秦九韶是会永远留存在民族史册而不朽的。在白寿彝担纲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之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六十一章题为“秦九韶”，专门论述他的经历和为人，以及他对数学的贡献。秦九韶不朽，不是因为他的人性光辉，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而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数书九章》，这才是今人研究秦九韶事迹的根本出发点。关于秦九韶的史料太少，脱离了《数书九章》来研究秦九韶，几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参考文献

- [1]（清）刘毓崧，通义堂文集，载《仪征刘氏集》[M]，扬州：广陵书社，2018.
- [2]（宋）周密，癸辛杂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 郭书春，秦九韶一将数学进之于道，载郭书春《论中国古代数学家》[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 [4] 郭书春，重新品评秦九韶，宋史研究论丛（辑刊），2009，191-236.
- 或见：郭书春，重新品评秦九韶，载《郭书春数学史自选集》[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 [5] 郭书春，秦九韶传[M]，成都：天地出版社，2024.
- [6] 杨国选，秦九韶生平考[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 [7] 李曾伯，可斋杂稿[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 [8] 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1.
- [9]（宋）陈騏、佚名撰，南宋馆阁录、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0]（宋）李曾伯著，单芳笺注，李曾伯词笺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 [11]（宋）洪咨夔著，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12]（宋）魏了翁撰，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13] 龚延明, 宋代官制词典(增补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14] 严北溟、严捷译注, 列子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5] 李迪, 中国数学通史: 宋元卷[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 [16] (清)赵翼撰, 乐保群点校, 陔余丛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7] (宋)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 [18] (宋)吴自牧, 梦粱录(中华再造善本)[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 [19] (宋)刘克庄著, 辛更儒校注, 刘克庄集笺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0] (宋)王迈, 臞轩集[M],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 [21] (元)脱脱等撰,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2] (元)佚名撰, 汪圣铎点校, 宋史全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年.
- [23] (周)左丘明传,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正义, 浦卫忠等整理, 杨向奎审定, 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4]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5] (清)倪灿撰, 卢文弨订正, 宋史艺文志补[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